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微信公共性的拓展与重塑

——以微信群为例

黄建华

〔摘要〕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强大的公共性和广泛的影响力会引发微信空间的信息震荡,从而改变微信公共性的样态。本文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运用 Dahlgren 网络公共性分析框架来探析这一变化:随着公共议题涌入,微信私领域被赋予更多公共性色彩;在信息从私领域流向公共空间的过程中,微信公共性随之延展;微信平台内的社会动员能高效联动线上线下多方力量,推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向良性转化;微信的群间节点和链接功能可串联起广阔的网络空间并重塑其公共性,由此为网络民主协商和社会治理提供良好基础。

〔关键词〕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微信;公共性;社会治理

一、问题提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成为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人民网,2020)。疫情的大规模极速扩散,吸引了各类媒体持续关注。在大量不确定因素冲击下,民众容易产生恐慌和认知失调;为缓解焦虑,人们主动从各种渠道寻求信息,却更易引起强烈的信息空间震荡(彭兰,2020)。

截至2020年9月,微信的月活跃人数达12.13亿,在疫情期间的用户使用率更是高达78.7%,成为了公众获取和扩散疫情信息最重要的渠道。日常生活中,构筑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微信多用于私人对话和情绪表达,常被质疑公共性的存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来袭,猛烈冲击着社会各方面,拥有广泛受众的微信能否有效传递公众声音,展示出公共性色彩?可否达成公共理性?网络民主是否存在,以何种形态运行?能否将其应用于社会治理,推进重大突发事件的良性发展?诸多问题接踵而至,成为难以回避的矛盾焦点。

二、文献综述

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即人人都有平等表达意见的机会,并在公众批判转化为公众舆论的过

黄建华,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副教授(重庆400715)。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新型城镇下语境下多元舆论场博弈的导向机制研究”(2016QNSH60)的研究成果。

程中得以体现。曹卫东(2004)将公共性与公共领域视为哈贝马斯“*offentlichkeit*”概念的一体两面:思想层面是指个体与共同体的特殊观念,表述为公共性;社会层面展现的是国家与社会间的话语空间,即公共领域。公共性与现代民主息息相关,体现为对理性的公开争论,对多样性的尊重,以及对公共权利的关注。近年来,尽管媒介公共性常被学者们视为理想化的存在,但仍有研究看到其对民主协商的重要意义,并希望沿此走一条“革命性变革”之外温和的社会道路(张菊枝,2011)。于是,当网络崛起后,这一概念不断被提及与重构。

(一) 网络公共性的相关讨论

网络技术的繁兴,促使学者从不同视角审视其公共性,体现为:第一、网络公共性的程度之争。网络空间能否促进民主发展,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网络从技术层面为个体意见表达和公民活动提供了更多自由空间,比传统媒体更有利于民主兴盛和公共领域复苏(Habermas, 2006; 郭玉锦、王欢, 2015);但是技术应用不平等,信息传递失真,在线讨论低质量,以及政治力量干预等原因,使部分学者判定网络公共性不如传统媒体(Morozov, 2011; 赵鼎新, 2012)。实际上,技术具有双重性,网络公共性关涉情况复杂:社会变革期,网络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社会稳定期,政治属性削弱,一般公共性增强(张殿元, 2017)。公众对事实性议题的讨论偏理性,容易达成一致;而在价值性议题上较难达成共识(申建林、邱雨, 2020)。第二、网络公共性的分化态势。哈贝马斯在不断反思中意识到公共性构成的广泛性和复杂性(Habermas, 1996a, 1996b)。受不同文化和利益等因素影响,公民会选择进入不同的网络公共空间,这更利于多元意见表达及弱势群体发声(Dahlgren, 2005)。从不同的功能规范、主题焦点、政策领域等视角进行审视,网络公共性可分化为不同的地域范围和亚文化领域(Hartmut, 2018)。网络平台已构筑起观点分化,多种声音并存的替代性公共领域(Batorski & Grzywinska, 2018)。第三、网络公共性的规模范围。Dahl(1989)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网络公共性展开讨论,微观层面虽影响较小,但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最有前景和建设性,大规模变革往往源于一系列运作良好的微观变迁。微观层面公共性虽不能抗衡国家权力,但可以利用社会正义和谐,有效促成宏观层面公共性发展(Goodin, R., 2006)。

(二) 微信与公共事件的研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爆发时,微信群中各种不确定因素随之增加,谣言更易扩散蔓延(陈雅赛, 2020);微信群“窃窃私语”、封闭审慎式的传播特征,使三方机构难以获取舆情数据,增加了评估干预难度(施威等, 2019);基于“熟人社会”的微信圈子与现实利益有诸多重合,更易推动大规模社会动员,引发次生危机(李伟权等, 2018)。过往针对微信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用户社交和认同需求,微信常被认为其公共性不如微博,难以形成公共领域(Gan & Wang, 2015)。但仍有部分学者看到微信群内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可以激发舆论声浪,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因此他们认为微信具有强公共性(蒋建国, 2015)。微信群还能让熟人关系趋向平等,有利于公共理性生成,为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良好基础(孙黎, 2014)。

(三) 社交媒体公共性分析框架

Dahlgren(2005)凝练出网络公共性的三个评估维度:第一、结构,涉及媒介组织与政府、资本间的权力关系,关注与民主相关的传播空间如何被形塑,并决定媒介是否具有开放性;第二、表征,与在线环境高度相关,是指各类媒体呈现的内容是否具备公平性、准确性和多元化等;第三、互动,一方面指向公民和媒体的接触,另一方面探究公众间互动,考察是否利于公共领域的构筑。Aslama(2006)认

为,Dahlgren 为网络公共性的理论化和实证调查提供了严谨科学的分析路径。籍此,Batorski & Grzywinska(2018)发现社交媒体公共性受现实社会事件类型的影响;尹连根(2013)提出微博颠覆了传统媒体的垄断格局,重构了我国公共领域;还有学者聚焦某一具体微信群,表示可在其中构筑微型公共领域促进基层治理(牛耀红,2018;于淼,2019)。

综上可知,微信形构于熟人社交基础上,且用户人数最多、应用最广,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影响力不言而喻。但微信群内对话及群间勾连起的网络空间,能否形成公共理性,推进民主进程,一直处于争鸣之中。微信如何展现出公共性,不单与媒介技术有关,更受到社会环境和网络议题等因素影响。过往对微信公共性的研究,或沉溺于细节,仅从微观聚焦单一社群,缺乏整体性思考;或从宏观进行思辨,缺乏实证调查;或轻视技术的客观限制;或忽略社会现实的重要影响。本文采用结构、表征和互动的网络公共性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微信群内容的剖析,及微信用户的访谈,挖掘公共性在微信中如何发生、运作、拓展与重构;并沿此探寻未来如何将其应用于社会治理,以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三、研究方法

微信公共性构建在用户间互动基础上,本文力求摆脱过去将微信用户置于“他者”从属地位的研究范式,从“主体建构”视角切入,运用深度访谈和网络民族志,挖掘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用户在微信群的信息分享、讨论和协商情况,探究其主体行动和主观感受,以期从微观到宏观系统厘清微信公共性的运行变化。

第一,网络民族志。建立在熟人关系上的微信平台,拥有一定的私密性。本研究参考了 Wang(2016)对中国不同阶层微信用户信息转发行为的调查方法;在知情同意、尊重平等和无伤害的伦理原则基础上,通过目的抽样和滚雪球,获得2020年1月1日到10月30日期间,43位来自不同省市地区,年龄在19岁到65岁之间的微信用户,分享、转发或讨论疫情信息的有效微信群127个;以此纵向剖析疫情前后微信群内容变化,以及横向对比疫情期间信息分享和讨论情况。

第二,深度访谈。依据塞德曼(2008)“最大变异抽样”和“信息饱和原则”,考虑年龄、文化、职业、地域等差异,特邀提供微信记录用户进行深度访谈。围绕疫情期间微信群内信息接受、发布和转发行为,互动状况和主观感受等开展调查;通过同一对象多阶段访问,及追访和回访,最大限度获取真实、可信和全面的资料;截止2020年10月30日,获得有效访谈对象11位,整理访谈记录近5万字。考虑到疫情期间特殊性,调查主要通过线上和电话语音进行。

四、结构:打破微信公共性边界

结构维度,刻画了社交网站交流空间的组织方式,即访问、言论自由和包容性/排他性的动态问题(Dahlgren,2005)。公共事务审议所有参与者都应平等,任何对讨论事项有意见的人都应被允许表达自身观点(Habermas,1996a,1996b)。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和可访问性,是保障公共性的重要基础(Batorski & Grzywinska,2018)。

(一) 冲破圈层,公共性拓展

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关系如同石子掷于水面推出去的波纹,是“差序格局”式的。杨国枢(1993)将其细分为家人(包括拟家人)、熟人、认识之人和陌生人。社交媒体时代,线上和线下社会结

构并无实质差异 (Dunbar et al,2015);微信一定程度呈现出圈层化趋势(张志安,2016)。有研究将微信社交关系划分为:私人空间、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吴璟薇、唐海景,2020)。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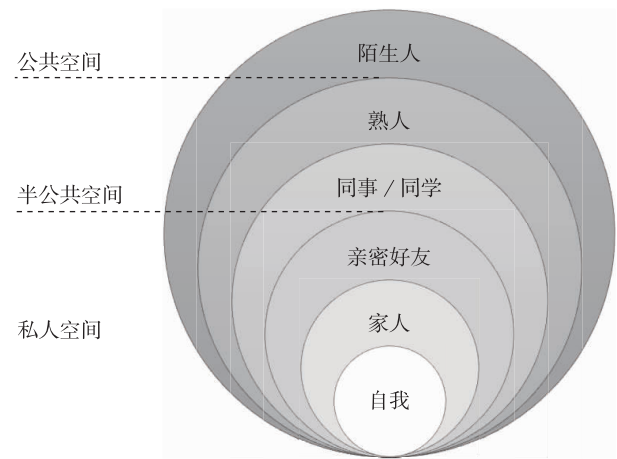


图 1 微信中社交关系的空间划分

疫情爆发初期诸多讯息尚不明晰,导致民众产生较大精神压力,相关聊天记录和朋友圈信息被截屏或录屏,被转发到各类微信群中。如,武汉某医院护士在 1 月底向家人袒露医院医疗情况和自我情绪的聊天记录,出现在此次观察的 8 个不同微信群里,既包括半公共空间,也不乏陌生人集中的公共空间。此外,一些从疫情严重区域返乡疑似感染病毒后就医困难的见闻,以及各地防疫人员封锁病毒感染现场等原本在私人空间中流传的视频、照片或对话记录,透过链接转发等功能,迅速在微信群间扩散,引发种种探讨。私人领域的意见,有倾向性地流出,影响着公共空间的对话。

以熟人社交为基的微信,有利于平等公共理性的生成(孙黎,2015),微信群形态各异、并置的组合特征,让公共议题能突破私领域,带来更多公共性(孙玮,2015)。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影响下,微信私人空间的对话、视频和照片及朋友圈发布的信息等,通过直接转发,或截屏、录屏并转发,让原本熟人圈子里相对私密的信息,突破私人关系和圈层界限,不断向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延展涌动;再通过一个个网络节点,串联起分散的微信圈层结构,链接起局部到整体,微观到宏观,整合了私人空间、半公共空间与公共空间;以此全方位增强了微信空间的公共性。

(二) 线上协商,多方联动

疫情期间,用户在微信群里联动社区、政府和物业等机构形成多方协商,有效推进了事件进程。以多地业主群为例,群成员们讨论较多的集中在:小区是否有湖北返乡人员、湖北籍车辆;如何督促物业、社区和政府展开应对措施;物业在抗疫过程中是否发挥了应有作用,并在群内展开监督;组织集体捐赠;通过转发、协商和讨论,达成“少出门,不串门”等共识;商谈如何保持个人安全,及不因个体行为影响公共安全等。疫情期间,建立在这类熟人关系上的微信群,发挥了微观公共领域在基层治理方面的潜能。

此外,许多由陌生人构筑的微信群,在疫情防控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初期事态发展迅猛,各级政府受人力物力局限,难以周密详尽地展开高效治理;经由微信群招募志愿者,并通过群内沟通协商,有力协助了当地的疫情防控及地方治理。以重庆市某社区志愿者群为例,群成员或经熟人介绍或由网络招募进群,最大规模达到 500 人,且绝大部分成员彼此并不认识。疫情期间,他们一方面链接当地社区等管理部门,另一方面衔接所负责辖区的居民群。群成员主要帮助不同社区进行线上网格化管理,主要任务是:掌握各地疫情动态,了解国家政策并分发到各自负责

的居民群;分享各自社区的疫情状况,协商处置方法;协调各类资源,解决居民实际困难,并为居民答疑解惑;以及协助辟谣等。所以,这类微信的组建,以处理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并延伸到线下实际行动。

五、表征:延展微信公共性内涵

表征维度,考察的是传播主体是否多元,传播内容是否具有包容性、公平性和倾向性等问题(Dahlgren,2005)。人们据此可看到社交媒体中话语代表的群体,以及这种表达与其他媒介渠道的关联。

(一) 议题彰显强公共性,私人话题较难介入

线下公共领域发生的事件会影响线上公共性的形态(Batorski & Grzywinska,2018)。根据对微信群内容的观察,可以探掘不同空间领域中公共性如何演化及呈现。

第一,私人空间公共性浸染。属于私人空间的微信群在1月20日之前,话题主要围绕置办年货、走亲访友、春节返乡及年终奖金等议题上,较少涉及公共议题。当疫情被大规模报道,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后,与之相关的信息分享、讨论和转发行为逐渐增多;尤其在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各类微信群私人议题逐步消减,转而开始关注湖北和当地疫情等情况。同时,微信群中有关个体的话题也多围绕疫情展开,如转发各类专家建议,提醒彼此注意安全健康;在调侃长久居家无事烦闷的状态时,也将自身置于公共话语框架中,如大量转发“出门就是给国家添堵,不出门就是给国家节省资源”等信息;私人空间的协商对话与彼此督促,演化成“保持社交距离”“遵守防控隔离”等社会行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来袭,公共议题严重挤占微信群中的私人议题,并让私人议题带上公共属性。

第二,私人话题难以切入。基于熟人关系的微信群,日常或被琐碎话题覆盖,或陷入沉寂;随着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爆发,不少微信群因公共议题蔓延而沸腾。疫情高发的1月23日到3月18日(内地首次无新增本土疑似病例),很多原本沉寂的微信群,人们开始不断围绕各热点事件分享信息及展开议论,以致私人话题鲜少能插入其中。观察发现,仅在2月3日成都发生5.1级地震时,三个主要成员在四川重庆的微信群关注了这一事件,形成了新的公共议题,而其余微信群几乎没有此类情况出现。即使有群成员发出某个与疫情无关的话题也很少有其他人发表意见或深入探讨,微信群内难以形成话题共振。因此,微信平台公共性不仅与平台性质和媒介技术有关,也受公共事件和话题性质的影响。

第三,公共议题占主导地位。此次共征集到21个以陌生人为主的微信群,人数规模普遍超300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17个疫情前组建起来的微信群为代表。这类群在日常互动中不仅聚焦本群组共同关心的议题,并且对各类公共事件较为关心;疫情期间,群成员们更显示出对事件进程的热切关注,发帖量明显增多。另一类以4个围绕解决疫情问题临时组建的微信群为代表。以建群时间为1月26日到2月17日之间的某“安心裤捐赠群”为例,群成员高峰时期达500人,且分散各地,进出自由;他们多通过其他社交渠道关注到湖北女性医护人员因防护服紧张且穿脱困难,遭遇生理期尴尬处境;网友们遂自发组织微信群捐赠安心裤并协商解决上述问题:前线医院收治情况如何;怎样有效组织货源,把控捐赠物资质量;怎么与各级政府协商,保证物资高效精准送达到医护人员;声讨捐赠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协商如何处置。这类微信群围绕某一亟待解决的公共议题积极展开讨论,当共同关注问题得以解决,微信群面临解散或陷入沉寂。由此可见,原本就对公共话题感兴趣的

微信群更可能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到来时加大关注力度,而平日较少交流公共事务的微信群,在疫情期间则几乎处于沉默状态。

（二）多元主体与意见表达

网络空间主体从构成形态和主体结构来看是异质性的,能为大众提供前所未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场域。截止2020年9月,中国即时通信用户规模高达9.31亿,占网民总数的99%;中国网民结构日渐多样化,更贴近真实人群分布特征。其中,微信用户人数众多、覆盖面广、多样化程度高,疫情期间其使用率更是高达85%,远超其他社交软件。

“微博是拿来(当新闻素材)看的,主要看大V们发的,(自己)基本不发言,讨论分享还是会选微信群。”(W5)

“疫情期间,感觉大家多少都会参与吧,不少多年潜水的人都被炸出来了。”(M6)

结合访谈内容及观察结果发现,微信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不仅使用人数众多,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且能为用户提供了更多平等发声的机会。微信用户受微信技术和关系结构等因素影响,在不同场景中意见表达策略虽有差异,但因他们能同时拥有不同属性的微信群,实际上是具备了更丰富的表达路径和呈现形态。因此,微信相较于微博和贴吧等社交媒体而言,逐渐演化为多元意见生长传播的空间。

（三）理性共识与情感倾向

第一,私人空间情绪表达与理性反思。微信私人空间不但参与者众多,话题讨论丰富,更可能出现情绪化表达。以好友群为例,有19个群不同程度表露出对中央政府的认同与赞许,对抗疫英雄的崇拜和歌颂等积极情绪;但当某些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抗疫行动滞后和管理不善,也会激发微信群内不满;有时还会出现对贩卖高价口罩不良商贩的谴责,对涉嫌故意传播病毒人员的声讨。其中,此次调查中的9个群曾展示出较严重的负面情绪。由此可见不可避免的是,疫情期间微信私人空间用户的负面情绪通过截屏转发等方式流转到其他类型的微信空间中,并经过不断发酵进而形成情绪极化的可能。但值得关注是,上述产生极端情绪的好友群中,也有3个群在后续讨论中现出为相关政府、机构和组织提供改善建议的情形,亦不乏对个体不良情绪的反思,提倡回归理性。

第二,其它空间情绪表达和理性互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受大量未知因素的冲击,规模较大的微信群在管理员以及群成员共同作用下,透过信息传播和协商探讨,逐步达成了理性共谋。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通过群管理员管理疏导来实现。如,某高校保洁部工作群,自2020年1月23日开始群内不断有工人转发有关武汉方面的谣言,群管理员随后提醒不要信谣传谣,之后这类消息的转发逐渐变少。再如,某广东毕业超过25年的大学同学群,一位长期定居香港的同学,不定期散播海外反华言论,引发集体愤怒,屡次劝解无效,最后被管理员驱逐出群。另一方面经过群内成员相互监管来达成。如,此次调查中有6个群在某武汉知名抗疫医生去世后分别转发了“哈佛大学医学院降半旗致哀”的消息,并且这些群内后续均出现成员间辟谣的情景,并且最后经成员们共同讨论达成了一致意见:此信息为谣言。这些观察结果在访谈内容中也得到证实。

“往群里转发信息,还是会斟酌下它的真假和权威性,担心成了造谣者会被大家鄙视。”(W8)

“我们不怕谣言,群里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会被证伪的,因为理性的、去求证的人也多。所谓理越辩越明,道越论越清。”(M6)

实际上,微信群内自由辩论的环境、群体压力和相互监督机制,容易在讨论基础上达成理性共识,推进事态良性发展,也可能出现情绪极化现象。因此,微信群的公共性和群体极化本身也是一体

两面的问题,若将微观的群体极化置于宏观社会考量,可能会展示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共识群体(陈红梅,2015)。传统公共领域代表的是精英阶层,而社会中大多数和边缘群体并未纳入这一主流话语体系。尊重差异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网络极化和网络激进主义呈现出的“反话语”是他们吸引社会关注、重新整编主流话语体系的有效途径(Dahlberg,2007)。

六、互动:再造微信公共性空间

互动维度,是公民之间观点和意见的交流(Habermas,1996a,1996b);体现为公民与媒体的接触,即理解、解释和使用输出的传播过程;以及公民与自己的互动,包括从两人对话到大型会议的任何内容(Dahlgren,2005)。

(一) 公众之间的互动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爆发会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严重冲击。疫情期间,空间隔离导致现实交流不便,线下沟通越来越转移成为线上交流。

“(疫情期间)大家都待在家里不出门,聚会啥的都没了,我的好多群都活了,好多N年没联系的人,都开始在群里冒泡。”(M9)

“这次疫情,任何一个热点,很快会传遍我的所有微信群,传播速度惊人。”(M10)

微信群内频繁的互动,一方面加强了情感链接,排解了疫情带来的焦虑,以及隔离带来的孤独;另一方面推动了事件进展,为抗疫等工作提供了便捷的沟通空间。

第一,群内互动。首先,议题与事件共振。当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来袭,微信群构筑起微型互动空间使得群内话题基本与突发事件进程同频。如,共有62个微信群对“武汉封城”相关新闻进行了转发讨论,且从不同视角形成共识:对全国疫情态势的担忧,对中央有力举措的拥护,对武汉人民牺牲奉献的敬意,以及对本地疫情防控的关注;此外,33个微信群不定期关注了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建设过程,并传递出对援鄂医疗队的崇敬。然而当新议题或新视角出现,微信群内话题也容易转移,缺乏长尾效应。其次,话语权趋于平等。人们在公共领域里,常以平等身份进入参与公共辩论,此时他们的角色和身份既不取决于财产,也不取决于出身,而是自由的讨论者本身(Habermas,1989)。不像微博大V和普通用户之间有较大的话语权差距,植根于现实熟人关系的微信群,成员间互动更趋平等,人人皆有发言机会。最后,对话形态多样性。一方面微信群成员间可以选择不直接对话,用代表自己观点的内容进行转发予以回应;这种方式常发生在公共空间中,可以有效避免因为陌生感和观点冲突引发的尴尬;虽观点更多元,但也存在对话质量不高等问题。另一方面微信群成员间也可以采取直接对话的路径,这类情况常出现在群成员较为熟络的环境中,当信息被他们分享后,群成员间会针对此内容发表自己观点并展开讨论。

第二,群际互动。微信的群与群之间依托微信圈子间的节点彼此链接。过往学者多从理论层面分析群际互动的深层结构,或认为其近乎无标度网络,具有庞杂众多的中间节点,在复杂网络不断演化中,可形成不可预期的结果(张志安,2016);或将微信群间的信息传递方式描画为“菊花链拓扑”(daisy chain)形态(Harwit,2016)。实际上,微信群基于关系链建构起来,信息可在圈际间勾连扩散。在日常生活中受制于真实社会关系的圈层隔阂,以及个体节点的信息“把关”作用影响,微信群际间难以形成有规模的公共话语空间。虽然不能排除微信中存在谣言散布,暗流涌动和不易监管的舆情风险;但是重大突发事件的议题往往具有强大公共性,容易引发全民关注,在不同节点共同作用下可串联起多个微信群,并通过群间互动迅速完成信息扩散,聚合成巨大的公共讨论空间。

（二）公众与媒体间的互动

第一,公众与主流媒体互动。“人民日报”微信端早在2019年12月31日就报道了武汉卫健委的疫情通报情况,而《人民日报》纸质版则晚了三周(李红涛、韩婕,2020);此外微信与主流媒体关系呈现日益扁平化趋势,主流媒体不断顺应时代变革主动拓展新闻分发业务,通过微信点赞、在看、阅读量及评论等功能,增强了与公众的连接和互动。

“大概12月底就在微博上看到武汉疑似不明肺炎的消息,但周围人关注的不多。钟南山在央视新闻接受采访之后,微信群里讨论开始热闹起来。”(W8)

尽管微博用户较早关注病毒传播,但所观察到的127个微信群中,仅有13个群在2020年1月底前发布或转发了武汉早期疫情相关信息,且只有零星对答与商讨,鲜少有高质量互动;全民性讨论出现在1月20日中央电视台连线钟南山院士之后的微信群内。疫情爆发后,主流媒体的新闻经由截屏录屏或网络链接转发到微信群内,并在公众话题引导、排疑解惑和消除恐慌等方面功不可没。

第二,链接其他网络资源。微信群从技术层面对众多社交媒体和网站呈开放状态,可将上述平台内容链接转发到微信群中;而微信群内容则不具对外开放性。平台间的单向溢出,能让微信接受海量信息,整合多种外部资源,提供多样化选择,引导更充分的观点共享,这也是微博等社交媒体无法比拟的信息分享方式。有学者认为相比微博的集中和交换信息,微信侧重于观点生产与信息扩散,通过多渠道整合功能,多维度解读信息,更有利于观点的多元化(张志安,2016)。

七、结论

微信在重大突发事件强大公共性外力作用下,通过链接转发和节点勾连等功能,整合串联起整个微信平台 and 外部网络空间,充分发挥了其民主性和公共性潜能。本研究根据Dahlgren网络公共性分析框架,解构重大突发事件中微信公共性如何生成、运作与重构。从结构层面来看,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讨论虽更多集中在私人空间,但由于事件自身强大的公共性、及微信截屏和转发等功能,能冲破固有圈层束缚,将微信链接成比微博等社交软件更难监管的公共议题讨论空间;微信群成员可以透过和政府、社区和物业等多方联动协商展开有效监管,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表征层面来看,微信群内私人议题淡化,公共议题凸显;多元主体参与,多样态意见表达;虽感性与理性并峙,但私人空间理性反思与公共空间理性共识并存。从互动层面来看,微信群内互动频率受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进程影响;日常隔离的微信群在事件影响下,依赖社交圈子的套连关系,从微观到宏观串联起巨大公共讨论空间。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微信群用户与主流媒体互动增强,实现了更平等的信息交流;微信群还可以链接一切外部信息功能,共享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多元观点。

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在重大突发事件冲击下存在观点分歧和群体极化的风险,某种程度阻碍其演化为哈贝马斯笔下理想化的公共领域;然而欣喜的是微信从微观到宏观层面,从私人领域到公共空间被更多赋予了理性共识和民主协商的可能,并闪烁着公共性的熠熠光辉。本研究希望通过剖析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微信公共性的发展变迁,为后续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和不同的理论视角:如,微信如何被更好地应用于社会治理、保障公众网络表达权、推进网络话语认同,推动网络社会革新等。然而,受制于时间和经费的影响及研究者自身能力的局限,此次招募的微信群数量十分有限。非随机调查也可能给结果带来一定误差,后续研究将进一步从数量到质量扩充调查样本,以期更全面客观地观察到微信公共性的联动机制。

参考文献:

- [美]埃文·塞德曼,2008:《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中研究者指南》,周海涛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曹卫东,2004:《权力的他者》,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陈红梅,2015:《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和群体极化——整合视野的思考》,《新闻记者》第5期。
- 陈雅赛,202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传播与治理研究——基于新冠疫情的网络谣言文本分析》,《电子政务》第6期。
- 费孝通,2015:《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
- 郭玉锦、王欢,2015:《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研究》,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 蒋建国,2015:《微信群:议题、身份与控制》,《探索与争鸣》第11期。
- 李红涛、韩婕,2020:《新冠中的非典往事:历史类比、记忆加冕与瘟疫想象》,《新闻记者》第10期。
- 李良荣、张华,2020:《参与社会治理:传媒公共性的实践逻辑》,《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牛耀红,2018:《社区再造:微信群与乡村秩序建构——基于公共传播分析框架》,《新闻大学》第5期。
- 彭兰,2020:《我们需要构建什么样的公共信息传播?》,《新闻界》第5期。
- 人民网,2020:《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908/c64094-31854170.html>。
- 申建林、邱雨,2020:《重构还是解构——关于网络空间公共领域命运的争议》,《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孙黎,2014:《We Chat:电子书式言谈与熟人圈的公共性重构——从“微信”出发的一种互联网文化分析》,《国际新闻界》第5期。
- 孙玮,2015:《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第12期。
- 唐嘉仪,2019:《场景与对话:微信群讨论如何影响态度——基于对比实验的微观解释框架》,《新闻记者》第11期。
- 吴璟薇、唐海景,2020:《流动的界限——社交媒体公与私的情境实践与管理》,《传播与社会学刊》第54期。
- 殷铭,2020:《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路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第3期。
- 詹世友,2005:《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公共性》,《社会科学》第7期。
- 张菊枝、夏建中,2011:《微观公共领域与中国社区自治实践》,《学术交流》第7期。
- 张志安、束开荣,2016:《微信谣言的传播机制及影响因素——基于网民媒介与社会多重视角的考察》,《新闻与写作》第3期。
- 赵鼎新,2012:《微博与政治公共空间》,《上海采风》第7期。
- 郑满宁,2018:《公共事件在微信社群的传播场域与话语空间研究》,《国际新闻界》第4期。
- Aslama, M., 2006, *Intellectual Scaffolding: On Peter Dahlgren's Theorization of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 Batorski, D. & I. Grzywinska, 2018,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public sphere on Facebook",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 21, No. 3, pp. 356 – 374.
- Dahl, R.,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hlgren, P., 2005, "The internet, public sphere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spersion and delibe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22, No. 2, pp. 147 – 162.
- Dahlberg, L., 2007, "Rethink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cyberpublic: From consensus to contest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Vol. 9, No. 5, pp. 827 – 847.
- Gan, C. M. & W. J. Wang, 2015,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of social media: A comparison of microblog and WeChat", *Journal of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ol. 17, No. 4, pp. 351 – 363.

Goodin, R. E. & J. S. Dryzek, 2006, "Deliberative impacts: The Macro-Political uptake of mini-publics", *Politics & Society*, Vol. 34, No. 2, pp. 219 – 244.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Habermas, J., 1996a,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Habermas, J., 1996b,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 Response Translated by Ciaran Croni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Habermas, J., 2006,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media society: Does democracy still enjoy an epistemic dimension? The impact of normative theory on empir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 16, No. 4, pp. 411 – 426.

Hartmut, W., 2018, *Habermas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rwit, E., 2016, "WeChat: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dominant messaging app",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0, No. 3, pp. 312 – 327.

Morozov, E., 2011, *The Net Delusion: How Not to Liberate the World*, London: Penguin.

Wang, X., 2016, *Social Media in Industrial China*, London: UCL Press.

(责任编辑: 蒋永华)

The Expansion and Reinvention of WeChat as a Public Sphere in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Taking WeChat Group as an Example

HUANG Jianhua

Abstract: The strong publicity and extensive influence of significant public emergencies can trigger information shock in the WeChat space, thus changing the state of WeChat public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is change by adopting online ethnograph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using the Dahlgren social media publicity analysis framework with WeChat groups as an example.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with the influx of public issues, the private sphere of WeChat is given more public overtones; the publicity of WeChat has been extended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flowing from the private sphere into the public space; social mobilization within the WeChat platform can efficiently link multiple forces online and offline to promote the benign transformation of significant public emergencies; the inter-group nodes and linking function of WeChat can link up a wide cyberspace and reshape WeChat publicity, which will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online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major public emergencies; WeChat; publicity; social governance

About the author: HUANG Jianhua, PhD in Educatio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State Governanc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